

“不逾矩” 论集

高为学 著

它是我在“不逾矩”之年写的
“不逾矩”之作，坚持以四项基本
原则为“矩”，反对违背四项基本
原则的“逾矩”思潮。

—高为学

上

“不造知” 论集

总主编：王德昭

本套书共分三册，每册约20万字。
第一册：《不造知》（上）；第二册：
《不造知》（中）；第三册：《不造知》
（下）。

——总主编

“不逾矩” 论集

高为学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逾矩”论集/高为学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7(2009.1重印)

ISBN 978 - 7 - 80171 - 354 - 4

I. 不… II. 高… III. 哲学理论—文集 IV. 1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630 号

书 名 “不逾矩”论集
作 者 高为学
责任编辑 钟 艺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 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上、下册)

出版前言

本书是作者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论争的文集，绝大多数已经发表过。

出版这个集子，是想从一个侧面给今人和后人研究那段思想史提供一些素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今人的眼光再去检视过去的那些争鸣，也许认为争论双方的是非曲直都不是绝对的。仁者可见仁，智者可见智，但思想必须统一到十六大的思想路线上来、统一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即不允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允许用“两个凡是”禁锢人们的思想。我们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众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2003年4月15日

自序

我是个七十有五的老朽，从上海解放以来，一直从事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已 50 余年。过去曾主编出版过四本哲学著作，都是教材或原著解释性读物；只有在 1994 年出版的《哲学热点新论》，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算是阐发了一些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次出版的小册子，除几篇写于八十年代以外，其余的都是 1990 年底离休以后写的，多为争鸣文章。孔老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收入本书的文稿，大多撰写于七十岁左右，因而把它定名为《“不逾矩”论集》。它是我在“不逾矩”之年写的“不逾矩”之作，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矩”，反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逾矩”思潮。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它是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是正确思潮，而背离历史前进方向的则是错误思潮。近二十余年来，我们党同各种错误思潮，主要是“左”的和右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斗争。

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理应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了纠正“左”的思潮，在 1978 年 5 月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年九月，我针对当时非议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种种论点，撰写了《承认不承认实践标准是真高举与假高举的分

水岭》一文，在上海市委党校召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上作了发言。会后，《文汇报》首先对这次讨论会作了详细报道；接着，《人民日报》又以《真高举与假高举的分水岭》为题，进行了报道。这篇文章先发表于1978年10月4日出版的《学习动态》，后把题目改为《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作为《文汇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一篇文章，在10月5日发表。当时主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胡耀邦同志，对该文作了批示，认为“这篇东西解答了人们思想上要解答的问题。”这就肯定了我对“左”倾思潮的批判。

社会思潮同其它事物一样，在一定条件下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在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时候，出现了“西单墙”，有人贴大字报、散传单，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怀疑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怀疑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有少数人宣传和“西单墙”差不多的观点，特别是贬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针对这股右倾思潮，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30日在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强调指出：“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天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在邓小平同志“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思想指导下，我在批评“左”倾思潮的同时又注意评析右倾思潮。本书收入了四十几篇文稿，大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另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包括被上海市委宣传部聘为兼职审读员时撰写的若干篇审读意见等。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到“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时说：“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

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1998年7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确有一些同志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在理解和把握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片面性、绝对化和简单化”；“有的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甚至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说成是邓小平理论的原意和中央精神”。根据这些精神，我在撰写评析错误思潮文章时，注意揭穿那些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用片面地歪曲地解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手法，“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的实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思潮，首先表现在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其哲学思想。早在1979、1980年，就有人把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作“时髦”的“新风尚”，在大小会议上、报刊上，散布了许多错误言论，吹起了一阵又一阵冷风，认为“两论（指《实践论》、《矛盾论》）都是从苏联三十年代的小册子里抄来的；《实践论》有经验主义倾向，《矛盾论》是“斗争哲学”的萌芽；都是“极左错误的理论基础。”这样，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理论标志的“两论”，就要被否定了。针对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思潮，我从1981年起，接连发表了《〈实践论〉绝不是经验论》、《试析否定“两论”的风源和教训》、《“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等七篇文章。《〈实践论〉绝不是经验论》一文，在1981年5月，提交上海市委党校理论讨论会，受到《文汇报》理论部的重视，同年8月20日载于该报内刊《理论探讨》。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上海哲学界引起了一些震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很重视这篇文章，详细摘载了该文的理论观点。另外，有人不同意该文的观点，向文汇报投稿，批评我的态度不端正，说人家批评《实践论》的文章是为了解放思想，现在就来指责那些批评《实践论》的文章，会妨碍解放思想，等等。幸好，这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这些非议才未成气候。否则，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麻烦。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人妄图篡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早在 1979 年 3 月，邓小平就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改革中一直存在着根本对立的“两种改革开放观”。在 1989 年动乱之后，我曾在上海市市委党校举办的《党政论坛》上，公开发表了指名批评赵紫阳的文章，题为《“庸俗生产力标准论”是篡改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基础》。他不承认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认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加资本主义管理；并且认为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实际上是抹煞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以资本主义去冒充社会主义。对于这种用“庸俗生产力标准论”去篡改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观点，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批评的。

淡化无产阶级政治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有人于 1997 年 7 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说：江总书记提出讲政治，“不是从根本上、理论上来强调讲政治。如果是这样，那又是一个大倒退。”这实在令人吃惊！我在震惊之余，提笔撰写了《讲政治是“大倒退”吗？》一文，发表在当时一家较有影响的刊物上。

从 1990 年起，我对于刘吉所散布的许多错误理论观点，进行了多次评析。他在 1990 年初，公开发表文章，宣传“现实的社会主义 = 小生产 + 公有制”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在上海影响广泛，异议甚多。我认为这个“公式”不妥，就在 1990 年下半年，写了《“现实的社会主义 = 小生产 + 公有制”吗？》一文，发表在广东《现代哲学》上。但我感到这篇文章对有些问题还讲得不透，于是又就这个“公式”写了第二篇文章，题为《中国建立的并非小生产社会主义》，指名商榷，并在文章末尾指出：“按照该文所提出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 = 小生产 + 公有制’公式，我国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小生产社会主义，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我们在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如果不坚持理论上的科学性，而去宣传什么小生产社会主义，那就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早产论’、‘资本主义补课论’、‘社会主义空想论’提供错误的理论依据。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分清理论是非，澄清思想混乱。这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所在。”这第二篇文章写好后，人民日报理论部主办的《理论参考》很快就予以刊载了。

刘吉在宣传上述错误“公式”之后，继续散布错误观点，最为严重的是由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知识分子创建的政党，过渡时期总路线违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倒退”，等等。这就否定了党的《决议》（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歪曲了党的历史。其问题如此严重，实属罕见。正当我想写文章评析该书时，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 25 日的来信，信中写明：“送上本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请协助审读。”我遵循以史实为根据、以《决议》为准绳的原则，在 1991 年 12 月上旬写了五千字的《审读意见》。本来以为只是一般性地听取读者意见，殊不知出版社是很认真的，还专门汇来几百元的审读费。出版社拿钱买意见，令人敬佩。后来在《审读意见》的基础上，我又撰写了一万多字的批评文章，投寄《南京社会科学》杂志，该刊在 1993 年第 1 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接着，《高校理论战线》又发表了摘要。

有的朋友戏称我是“批刘（吉）专业户”。这不过是茶余饭后说笑而已，不能当真。刘吉的错误观点很多，我收入本书的 10 篇东西，只涉及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说我是“批刘专业户”是不够格的。但是也须承认，我确实对他有着较多的关注。因为我和他都在上海，又都是搞理论工作的。同在理论战线，而观点迥异，必然会有碰撞，发生理论观点的交锋在所难免。如果我对发生在身边的错误理论观点置若罔闻，那就是失职、失责，对不起党和人民。

《交锋》可以说是集多年来错误观点之大成，其要害就是同四项基本原则交锋。这本书在1998年初出笼后，一些地方部门用公款购买，大小报纸频频转载和捧场。上海有个小报吹嘘道：“上海市、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在会场书摊上将此书一抢而空，先睹为快。这本书就是《交锋》”。说来也奇怪，这本著作，正好是以刘吉为总顾问。看来，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交锋》出笼之后，该书作者随后又相继出版了与该书观点完全一致甚至更加露骨的《沉浮》、《呼喊》。我在建国五十周年前夕，撰写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学〈邓小平思想年谱〉，批〈交锋〉、〈沉浮〉、〈呼喊〉》一文，主要批评这三本书中否定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歪曲后二十年的错误观点。文章写好后，上海某校主办的刊物的主编认为该文内容较好，有理有据，文字通顺，定于2000年第一期发表。可是，该校领导却认为“文章太尖锐，不拟发表。”这使我甚感意外。于是，我给该校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三本书，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认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应该否定的‘旧时代’；胡说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的前三年工作犯了‘左’的‘方向’错误；还鼓吹无产阶级政权‘更替论’。这些论点是违反邓小平理论和历史事实的，不能任其自由泛滥，而应该加以批驳。我出于一个老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心，对上述错误观点作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评析。文章有些地方所以比较‘尖锐’，是因《交锋》等书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极其尖锐的，而不是我故意把问题搞得‘尖锐’，更没有随便上‘纲’上‘线’。刊物主编已决定发表的文章，而校领导却认为不能刊用，实在令人感到遗憾。”这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

再说一说关于1999年新版《辞海》“为毛泽东摘掉‘马列帽’”所引发的一场争论问题。我和我所在的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评

报协会的几十位离休干部，均反对新版《辞海》的这种做法，我们以协会的名义给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写了信。我又以个人名义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全国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呼声，受到了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重视，对新版《辞海》的出版单位进行了批评，指示封存已出版的 5000 册书，决定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七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导语，都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定语，俟换页以后再出售。在 2000 年国庆节前夕，市委宣传部特派理论处处长、上海辞书出版社党委书记兼副社长以及办公室主任，专门拜访上海市老干部评报协会，感谢老同志对《辞海》的关心和帮助，并赠送一部新换页的彩图版《辞海》及五套《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这充分说明，《辞海》问题的争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我们本来以为关于新版《辞海》的争论已经结束的时候，香港《争鸣》杂志 2000 年 11 月号，发表题为《极左派围攻新版〈辞海〉》的文章，攻击栾保俊、高为学为“极左分子”，污蔑“当前中国仍然极左当权”，并极其阴险地为《辞海》主要负责人的所谓“不畏强权，极力抗争”而“鼓掌”。为了回答《争鸣》，栾保俊同志和我联名写了《项庄之剑何指？——评怀冰〈极左派围攻新版辞海〉》的文章，批驳了种种谬论。他们的那些谬论实在不值一驳。但是，《争鸣》插手，更可以看出是否“为毛泽东摘掉‘马列帽’”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能小看这场斗争的重要性。

新版《辞海》在“毛泽东”条目中删去“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不良影响是很大的。谓予不信，请看一个事实：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 2001 年的第 10 期，发表了《历史召唤他归来》一文，文末在叙述了“《辞海》一般不再用伟大、卓越、杰出等形容词”之后，得出这样结论：“至此，20 世纪中国历史人物葆有‘伟大’一词者唯有孙中山先生一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唯

一’！在这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中山先生在向我们走来！”这篇文章，正是以《辞海》把“毛泽东”条目中的“伟大”删去，而只有在“孙中山”条目中保留“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为由，得出了20世纪中国历史人物只有孙中山是“唯一”伟人的结论。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伟大，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伟大。正因为这样，他们认为在这新的世纪到来之际，要靠召回孙中山，而不是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早在2000年8月，我在《谁“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文中就指出：《辞海》在“毛泽东”条目中删去“伟大”之后，仍称孙中山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这就表明，《辞海》编者并不认为对任何重要人物都不能用颂扬性的评价语，如对“孙中山”就一定要用。我认为这样称呼孙中山是完全恰当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孙中山和毛泽东之间，《辞海》编者要厚此薄彼呢？”正是这种“厚此薄彼”，为只有孙中山是“唯一伟人”这个有所偏颇的结论提供了“根据”。

回顾二十余年来，特别是离休11年半来，我基本上是在打笔墨官司中度过的，何其苦哉！但是，苦与乐是对立的统一，有苦也有乐，苦乐结合，生活会更充实。我的文章经过一番折腾之后，绝大多数都发表了，实现了它的社会价值，可以说是先苦后乐，苦中有乐。现在，将我的部分文稿汇集成册，使之与海内外读者见面，更是其乐无穷啊！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但是我敢保证：所言都是真情实感，没有添油加醋，只有七折八扣。本书在风雨中诞生，还将在风雨中经受考验。我真诚地恳请读者多提意见！

定稿于2002年建党81周年之夜

目 录

自序 (1)

评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

《实践论》绝不是经验论——和陈章亮同志商榷	(1)
“两论”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10)
试析否定“两论”的风源和教训	(16)
“中国化”决不是“封建化”	(27)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31)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道路	(44)
党性与实事求是方法	(54)

评篡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庸俗生产力标准论”是篡改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理论基础	(63)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论” ——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70)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石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 40 周年 ······	(82)
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评《试析两种坚持观》 ······	(95)
改革开放辩证法三题 ······	(108)
引进外资的宣传要讲辩证法 ······	(118)
冲破“姓社姓资”的羁绊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新形象”吗？ ——评《塑造新时期共产党员形象》 ······	(119)
中国“没有内部发展动力”吗？ ——评《走出中国现代化之路》 ······	(122)
研究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辩证法的运用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在全国马哲史学术讨论会大会上的发言稿 ······	(123)
新发现还是大背叛？——评李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 ······	(127)

评淡化无产阶级政治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

为何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134)
对“三个不提”的意见 ······	(135)
对上海两报宣传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点意见 ······	(138)
精神文明建设与讲政治 ——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讲政治”的一点体会 ······	(141)
讲政治是“大倒退”吗？ ······	(150)
“一切向钱看”是拜金主义口号 ······	(157)
“大公无私”三辩 ······	(159)
不能提倡个人主义 ——评《道德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的现实》 ······	(166)
何以要为个人主义“正名”？	

——读《与总书记谈心》引发的一点思考 (172)

评“改革急先锋”刘吉的观点

“现实的社会主义 = 小生产 + 公有制”吗? (177)

中国建立的并非小生产社会主义——和刘吉同志商榷 (184)

致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函 (190)

为反映刘吉同志宣传错误观点给中共上海市委新老领导

同志的一封信 (193)

附录:关于刘吉同志的几个错误理论观点摘要 (197)

对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的审读意见 (203)

对刘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某些观点的评析 (209)

对《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一文的意见 (224)

评所谓“贫富差距”的“见解” (227)

附录一:贫富差距目前很难避免 平均主义是一个大败笔 (229)

附录二:澄清对“贫富差距”的一些说法 (230)

搞清还是搅浑“什么是社会主义”? (231)

对《正确认识党的建设和党的现状》的意见 (235)

评同四项基本原则交锋的《交锋》

同谁交锋? ——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237)

“实录”,还是歪曲的记录? ——评《交锋》 (267)

解放思想,不能只反“左”不反右 (273)

不是纠正极左,而是“纠正”社会主义

——评《交锋》一书的歪理邪说	(277)
片面宣传与歪曲解释的十种表现	(287)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纪念建国五十周年	
——学《邓小平思想年谱》，批《交锋》、《沉浮》、《呼喊》	(298)

评“为毛泽东摘掉‘马列帽’”

评“为毛泽东摘掉‘马列帽’”	(317)
附录一：99《辞海》重新评价毛泽东	(326)
附录二：《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给宋保俊的回信	(327)
附录三：关于《辞海》“毛泽东”条头衔修订的情况	(328)
致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领导函	(331)
附录：辞海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致各位副主编函	(336)
谁“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答《辞海》主编《致〈中流〉杂志编辑部函》	(339)
附录一：营造良好的社会气氛和学术环境	(348)
附录二：夏征农：《致〈中流〉杂志编辑部函》	(349)
附录三：如一：是谁“不分青红皂白”？——与《百年潮》商榷	(350)
项庄之剑何指？——评怀冰《极左派围攻新版〈辞海〉》	(353)